

# 等效性原理

在前文中，我們指出了恩格爾定律可以很自然地推廣到任何一種具體的物質產品上去。並且分析了這種推廣能夠成立的微觀基礎——自然約束、技術經濟約束和合理性選擇約束。正是這些約束的存在，保證了任何一類具體的物質產品的生產和消費增長，不論該產品的具體特性及生產工藝如何，都服從於S曲線所描述的唯一宏觀增長規律。

在本章中，我們要把這個結論推廣到整個物質需要及其生產領域中去。這首先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人類的物質需要是無限的嗎？下面我們從這個問題開始，進行討論。

### ◎ 似是而非

迄今為止，對於任何一類具體的物質產品，其生產和消費增長都服從S曲線這一結論，是得到普遍承認的。這意味著，人對任何一類具體的物質產品的需要顯然是有限的。但是，說到人類的整體物質需要（注意：不是需求）是有限的，則會受到絕大多數人的反對，而且也缺乏明晰的證據。人們一般認為人類的物質需要是無限的，其基本邏輯是，隨著技術、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的變化，物質需要變得越來越多樣化，有些需要消失了，而新的需要卻在不

斷湧現。因此，結論似乎只能是人的物質需要是無限的。情況果真如此嗎？

**自然約束** 首先，對於任何一個人而言，其每天的時間資源是有限的，最大限度不可能超過每天 24 小時；其次在單位時間裡，任何個人的活動量是有限的。這就是我們分析物質需要的多寡與自然約束之間關係的兩個基本前提。而這兩個前提是以一系列的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規律為基礎的，因此它們堅如磐石，牢不可破。人的物質消費活動顯然是人類的某類活動，因此，它也就無法逾越上述兩個前提或約束。

人們要進行滿足物質需要的消費活動，首先需要時間，其次在單位時間的消費活動量也有極限。如果以 24 小時為一個因子乘以人的單位時間的極限生物活動量（不妨取從事重體力勞動的男子一小時所需能量為此極限值），就得到一個有限的數值，我們稱此為最大外延物質消費活動量指數，此數在 5000 千卡/天和 6000 千卡/天之間。如果將這個數值再乘以人口總量，就得到人口最大外延物質消費活動量指數。

這個數值的有限性表明，即使不考慮收入的限制，那麼任何個人或有限的人口總體的實際消費能力（= 物質消費活動指數 × 物質消費量 / 千卡；後一因子儘管因時而變，但顯然也是有限的）必然是有限的。這個結論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從觀念形態上說，人的物質需要儘管種類和數量可能是無限的，但其受到實際物質消費能力有限性的約束，所以實際物質需要必然也是有限的。要知道，消費活動一方面要有能被消費的對象（包括物質），另一方面還要有消費的能力。二者缺一不可。例如，喪失聽力的人就無法進行享受音樂的消費活動。那種超出實際消費能力限制的純粹觀念形態上的物質需要是沒有實際意義

的。我們稱在物質消費能力約束之內的物質需要為內稟物質需要。

在通常的經濟分析中，對於物質需要受有效需求或實際收入的制約是得到公認的，但對於物質需要受內稟物質需要的約束這一點，則幾乎沒引起注意。

**經濟約束** 儘管任何個人的物質消費能力或內稟物質需要是有限的，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需要在任何時期都總能得到滿足。例如，當人口總體很大時，這類需要的總和儘管有限，卻仍然可以大大超出一定時期內某種技術條件下的資源約束。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技術、經濟方面的約束，消費能力或內稟需要與實際供給或生產能力之間的矛盾就無法得到解決。因此，通過技術、經濟方面的約束，消費能力或內稟需要受實際收入或有效需求進一步約束，以和實際供給或生產能力相銜接。有時還要通過非經濟的社會配給來進一步協調個人的各種需要的滿足，以及個人需要與社會需要的滿足之間的矛盾。

**局部理性約束** 在前文中，我們曾就某種具體的物質需要在比較充分滿足後的情況作了分析，並指出在這種情況下，技術經濟約束的有效性已基本喪失，而自然約束及合理性選擇約束則成為主要的約束因子。在本文中我們要把這種看法推廣到整個物質需要的討論中去（在後文中，凡不指明的地方，所說的物質需要均指內稟物質需要）。

**需要與需求**。首先討論合理的需要大於有效需求的情況：非洲飢民的普遍營養不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那裡的人民對於各種維持基本生存的需要顯然是合理的，但由於各種因素所導致的經濟的極不發展，這些需要遠沒有得到充分滿足，這要通過各種途徑改進或減弱供給約束來解決。

更值得注意的是合理的物質需要小於有效需求的情

況。發達國家富人營養過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例如，美國人的全部生物量比適值超出了2.5億千克以上（人均一千克以上）。如果考慮到其中尚有相當一部分人處於較為貧困的狀況，那麼其他部分人的不合理的物質需要程度肯定更為嚴重。

這個例子提醒我們注意：技術或經濟的約束並不能保證人們一定能作出合理的或有效的選擇。而這對個人或社會而言，不僅是一種浪費，也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益處。對此，我們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合理的內稟物質需要。它小於內稟物質需要。

在發達國家中，處處都可以看到過度的物質消費。這一方面說明了僅有經濟方面的約束不足以保證人們的消費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在越過收入約束之後的很多消費如何合理化，尚有很多問題可以研究，以便使人們能做出自我節制和進行正確的社會干預。

物質需要與非物質需要。實際上，人的合理的物質需要（或消費）如同食品需要（或消費）一樣，不可能無限增長。例如，人的住房、冰箱、電視機、汽車等物品的佔有和使用並不是越多越好。相反，正像吃得過多、過好會造成身體不適和疾病一樣，物品佔有或使用過多不僅不會使人感到舒適，而且還要為此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和煩惱。例如，因房子過多無力打掃而積滿灰塵，使人生病和感到孤寂。又如，西方社會流行的空調病。

因此，如同食品消費到一定水平時，人們會發現多消費些非食品更有利於身心的健康和自身發展一樣，當人們的物質消費或佔有達到一定水平，其不利性已變得益發明顯時，必然開始提出新的問題：再作點什麼好呢？由於人的活動頻率、活動量和時間是有限的，即使技術或經濟的約束已不那麼有效，人們也會明顯地看到，更多地把時間

用於「消費」某些非物質產品有更大的相對有利性。這並非僅僅由於價格所顯示的一定時期內資源相對稀缺性的作用，更深的底蘊是人們對生活不同層面、不同部分的相對豐富性的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

正像人的食物在達到一定的水平後，就能充分保證健康地從事各種活動，過多反而有害一樣；與此完全類似的是，在物質消費達到一定水平之後，就能保證人們在身體和精神方面從事非物質的活動。例如，不同時代的很多大科學家和傑出人物就並不是在當時物質生活水平最高的環境下，創造出很多重大的成就的。

通過對這些不同時代的傑出人物的研究，<sup>①</sup> 不難得出這樣一個重要結論：為了保證人能夠有充足的體力、精力和智力，有效地從事各種積極的物質性和精神性活動，所必需的合理的內稟物質需要（量和質）顯然是有限的。關於這一點，在本文其餘部分中，還要從各種角度加以論述。

**全局理性約束** 如果說為了限制某種產品有效需求中的不合理部分，除了上述三種約束之外，還應補充第四種約束——即社會性干預，又稱全局理性約束的話，那麼對於物質產品的總有效需求中的不合理部分，就尤其如此。因為具體產品有效需求的不合理部分總合起來的數額和惡劣後果可以是十分驚人的。例如，當今世界的毒品消費額在一千億美元以上。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吸毒王國，所消費的各種毒品約佔世界毒品總產量的65%。販毒、吸毒以及由此引發的街頭槍戰和其他各種犯罪活動，已經成為美國的頭號內政問題。在美國吸毒者中有大量遊手好閒者、無家可歸者自不待說，更嚴重的是，有相當大一部分的學生、教師、工人、經理、政府雇員及其他受過高等教育的

---

① 弗蘭克·戈布爾：《第三思潮》。

專業人員也加入了吸毒大軍。據美國聯邦政府 1989 年 7 月發表的一份專門報告，一生中至少試用過一種毒品的美國人已達 7200 萬。這就是說，在每三個美國人中間，至少有一個人品嚐過毒品的滋味！與此同時，這種強烈的北美毒品需求，又有力地刺激並維繫著南美的毒品生產力和源源不斷的毒品供應。在拉美國家，如哥倫比亞、玻利維亞、秘魯等國，毒品經濟佔了國民經濟成分的相當大的部分。<sup>②</sup>

如果按照前一章煙草之例的處理辦法來進行估算的話，一裡一外也要在 1500~2000 億美元之間。最驚人的情況是，當前世界軍費開支總計每年約有上萬億美元之鉅。所有這些情況都發生在有效需求的背後。如果有朝一日，有人能對總合有效需求中的不合理部分作一測算，相信將有數萬億美元之鉅。節省這部分開支，儘管將降低世界人均 GNP，但並不會降低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反而還會提高。從這些具體的不合理需求的例子不難看出，所謂買的願買、賣的願賣這類經濟約束或自由市場機制，不僅難以有效地調節合理的供求數量，而且對供求方向的調節尤其無能為力。最為可笑的是，在西方經濟學中，竟有人把這類事例都歸結為個人所做出的理性選擇，認為社會干預將會扭曲個人偏好，從而導致低效率。實際上，在限制不合理的需求、降低資源消耗、提高生活的水平和質量方面，社會干預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 ◎ 需要的解析

為了更透徹地分析上述不合理需求的形成，有必要對人類的需要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為使討論簡便起見，我們把

---

<sup>②</sup> 劉列勵：〈世界毒品經濟觸目驚人〉，《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8 日。

人類的需要抽象成三種類型：基本需要、發展需要和享受需要。下面將對這三種需要的性質及滿足形式進行討論。

**三種需要的性質** 基本需要的主要性質在於其維持人類生存的性質，因此它主要或全部是通過物質消費來得到滿足。但是，滿足這種基本需要的物質構成卻可以大不相同。

例如，對於滿足人類的基本營養需要而言，已知全部採用植物食物是不能有效地滿足人類對蛋白質和脂肪的需要的，因此，必須攝入一部分動物性食品。但是，攝入多少動物性食品，不同生活方式間的差別卻很大。這裡一種方式是採用歐美式的膳食構成，以動物性食品為主；另一種是日本式的膳食構成，動植物食品各佔一半。據統計，日本1980年和美國1970年的人均GNP是一樣的，約為五千美元（1970年美元）。但美國1970年人均動物類食物消費比日本1980年的人均水平多出164千克（詳見後文）。

由於這種物質構成的不同，產生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物質資料的消耗強度大不相同。以上例為依據，我們不難看出，在滿足人類營養的基本需要方面，美國方式比日本方式至少要多出一千斤穀物／人·年（植物轉化為動物性食品按3比1算）。

由此，還會產生一系列的派生後果，即人均需增加一畝耕地，以及化肥、機械、農藥等投入的增加，這些均會對一個國家的生產方式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生存本身不是人類的唯一目的，生活不僅是要健康地活著，還要健康地工作、學習和娛樂。為此，人們必須產生、形成某些發展的需要，這些發展需要的滿足是人們能夠更好地運用自己的體力、精力和智力於各種目的和目標的前提。

發展需要與基本需要的性質的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前者的滿足方式在物質消耗強度不同的手段之間有很強的代



替性。

例如，一個人用圍棋來渡過自己的閒暇，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和反應能力等；另一個人用掌握駕駛技術來渡過自己的閒暇，達到類似的目的。如果兩個人在各自的領域裡都是佼佼者，從而彼此不分高低，或者說從綜合加權能力的角度說，兩個人有同等的能力，且都達到了各自的最大滿足程度和水平。但是，二者的明顯差異在於閒暇消費所需的物質資料消耗強度極不相同。前者在進行活動的過程中所需的物質資料數量和質量幾乎可以忽略，而後者在進行活動的過程中卻對物質資料的質量和數量都有極高的要求。

又如，就鍛煉和發展人類的體能和技巧而言，各種運動方式除了在能量和營養上超出必需量的補充方面是共同的，但在支持不同運動方式的物質資料消耗強度上卻可以大不相同。例如武術和氣功，幾乎不受場地、器材的任何限制，而馬術、摩托艇則要受場地、器材、資源的極大制約。

顯然，當我們的眼光從微觀轉向宏觀時，由上述不同人所構成的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僅在宏觀消費方式的整體物質資源消耗水平上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由此派生出的滿足這種物質消費方式的整體生產供給體系也會有極大的不同。

對於享受需要而言，與發展需要的性質極為相似，但有一點微妙的差別：這就是發展需要具有較為清楚和直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而享受需要則具有較為含糊和間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如果我們說發展需要本身（如發展體能和技巧）並無不妥之處，只不過其選擇的問題主要發生在滿足這種需要的具體的過程和由之而來的物質消耗強度上。那麼，對享受需要本身而言，如無目的的消磨時間，則有可能產生和形成很多不合理的需要。

**基本需要滿足之後的選擇及實現形式** 明瞭上述三種



需要的基本性質之後，對這個問題就不難做出回答。

對於滿足基本需要的選擇而言，主要在於選擇達到同樣生存目的和生存水平的物質構成，其實現方式主要取決於經濟約束和自然約束的具體形式。

在基本需要滿足之後，情況有了很大的不同。這時的關鍵之點在於，要對滿足發展需要的各種可以相互替代的非物質手段和物質手段做出選擇，還要對享受需要中的各種因子做出選擇。

要對滿足上述需要的手段做出合理選擇，僅靠經濟約束是非常不夠的，例如，前文所說的經濟約束並未有效地解決美國人均生物量超出最適值的問題。如果再仔細地觀察一下我們周圍的人和事，當不難發現很多不合理的消費和供給問題，儘管其仍在經濟約束之內。

例如前文所舉的例子說明，在西方國家中，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伴隨著大量牛肉的飲食而過量吸收飽和脂肪，是引起心臟病、肥胖症和其他失調症的因素。實際上，極多的事例反復表明，沒有人類理性的一定程度的發展，缺少以一定的合理的社會消費意識為基礎的社會性干預，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僅靠技術經濟約束是不可能根本上解決不合理需要的問題的。

## ◎ 似非而是

《未來的經濟》一書的作者明確提出了下述觀點：整個物質生產的宏觀經濟也服從 S 曲線。<sup>③</sup> 但他把這種特性僅僅歸結於資源的有限性，這就使他的觀點有較大的局限性。

③ 保爾·霍肯：《未來的經濟》第 92 頁。

他認為，由於物質資源的有限性，物質生產遲早要停滯在使資源消耗與更新處於動態平衡的飽和水平附近。但是，如果科學技術水平提高了，如可以更多地、更便宜地利用太陽能，物質生產是否仍然會進一步增長呢？這是他所無法回答的。

我們從任何一種物質生產的增長服從 S 曲線的事實中，可以發現他的觀點的局限性。例如，對於某種物質生產的增長而言，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資源約束和供給約束可以被忽略（即對於任何一種具體的物質產品，當把所有資源都用來生產它時，可近似地看為沒有資源約束），這時需求約束是主要的；需求約束是一種非自然資源約束，是由收入和人本身各種內在特性所決定的內部約束。

為了克服他的觀點的局限性，我們有必要對恩格爾定律作出更為一般的推廣，並由此闡明整體物質生產增長也服從 S 曲線的一般機制。下面首先討論廣義收入的概念，然後對廣義恩格爾定律作出描述和分析，最後對廣義恩格爾定律的一些有用推論進行討論。

**廣義收入的概念** 任何一種個人的活動都被視為是受以下兩種限制所制約的經濟活動，即個人的貨幣收入和個人的「時間收支」。兩者加在一起就是消費者為滿足個人目的所擁有的社會收入總額。<sup>④</sup> 對社會收入總額的這個描述，我們要做一些修正。因為，認為「時間的價值等於個人把這段時間用於工作時，它能為之帶來的額外貨幣收入」這種算法存在著某些問題。試問一個人能夠 24 小時都進行工作掙得更多的收入嗎？因此，我們必須在上述個人時間收支中扣掉部分時間——生存時間。

生存時間的定義：保持一定數量人類的體能、技巧、

---

④ 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第 239 頁。

智能的簡單再生產所必需佔用的時間。

發展時間的定義：使人類的體能、技巧以及智能得以在數量上擴大和質量上提高所需佔用的時間。

純閒暇時間定義：在 24 小時中，扣除上述兩類時間之外的時間，稱之為純閒暇時間（這個定義是很模糊的，這是由於純閒暇時間利用的目的性和效果不是明顯的和直接的，它既可能有利於生存和發展，也可能不利於生存和發展。在沒做進一步具體分析之前，我們只能把它作為中性的時間來處理，也就是說要假定至少在短時期內還看不出它對生存和發展有何直接的意義）。

顯然，在實際生活中這種劃分絕不可能是界限分明的。例如，工作時間既是生存所需，也可能是一種發展和享受需要的滿足。但從觀念上說，我們不妨把它分成三種時間，並歸入上述純粹的各類中去。現在可以給出下述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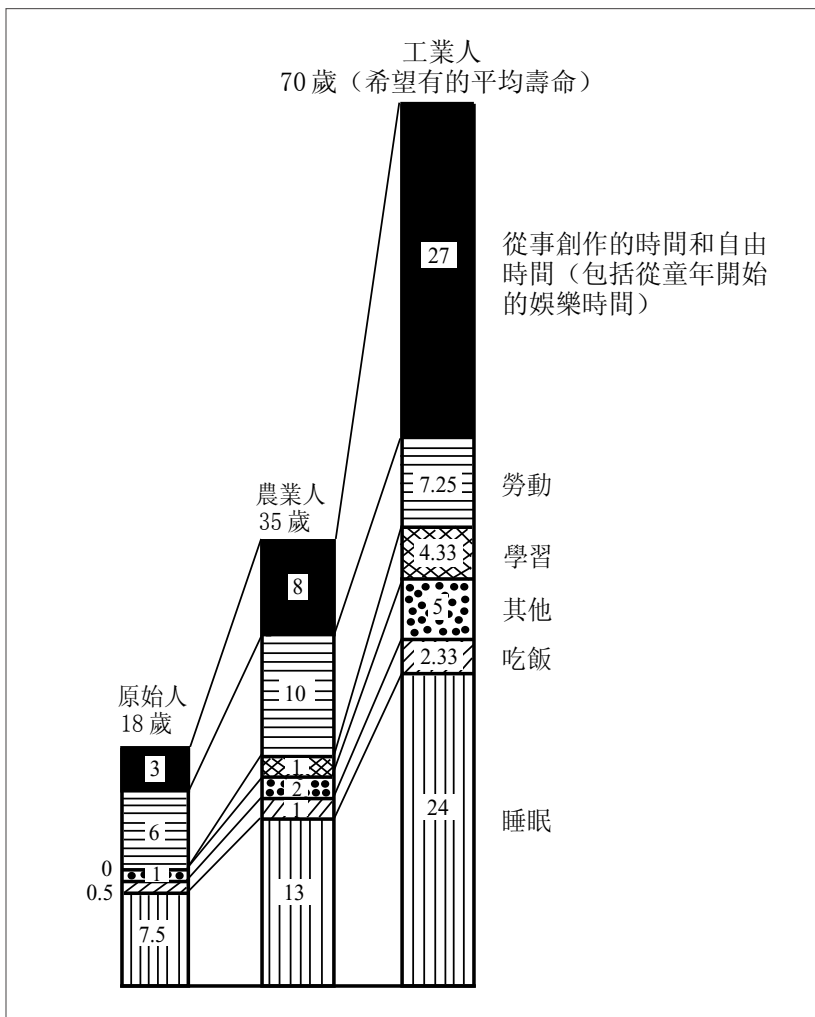
廣義收入的定義：即個人的貨幣收支加上個人的純閒暇時間收支及部分發展時間收支。

這樣定義的理由是很明顯的：第一，生存時間（如睡眠時間）不能另計一筆價值，否則會出現重複計算，並與現實相矛盾；第二，有一部分發展時間是人類保持一定的更新水平所必需的，是不得不付出的，難以完全自由支配。

**廣義恩格爾定律的描述** 到目前為止，人類近幾百年的發展趨勢有兩個特點：第一，貨幣收入（以不變價格計）不斷增加；第二，工作時間（生存時間的一部分）逐步縮短，即純閒暇時間不斷增加（見圖~16）。這當然意味著廣義收入的增長。有了這些概念，我們可把廣義恩格爾定律表述如下。

廣義恩格爾定律：隨著人均廣義收入的增加，遲早會出現這樣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即物質消費佔廣義收入的比重下降，而非物質消費所佔比重上昇。

圖~16：人在從事活動的結構方面的變化



資料來源：轉引自格·普·阿波斯托爾主編：《當代資本主義》。

這個一般推廣使《未來的經濟》一書作者的結論（即物質生產總體服從S曲線增長規律）成為廣義恩格爾定律的一個特例。因為這裡並不要求物質生產必須停滯，只是說隨著人均廣義收入的增加，在達到某個臨界水平之後，非物質消費的增長將比物質消費的增長更快。這就如同恩

格爾定律並不要求食物消費的絕對水平停滯或下降一樣。同時，這個推廣也不要求自然資源的絕對有限性。

廣義恩格爾定律的精微之處在於，它擺脫了以一定時間內的物質資源的有限性為其唯一基礎，這就超越了樂觀派關於人類利用物質的能力的長期無限性的詰難。這個定律既以一定時期內物質資源的相對有限性的自然約束（轉化為技術經濟約束）為其基礎，而且也以人們能看到過多地進行物質消費的相對不利性，以及非物質消費的相對有利性和豐富性，從而作出合理性選擇的社會約束為其基礎。

這樣一種推廣具有一定的反直觀性，但是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它與恩格爾定律一樣堅實可靠。

**再談物質需要與非物質需要** 有的學者把人類的需要分成兩類：一類是人的肉體存在的需要；另一類是與社會知識的積累和通過個人的、倫理的、道德的需要而獲得知識的社會交流聯繫在一起的，並與社交、認識、戀愛、威望等方面的強烈慾望聯繫在一起的需要，所有這些都可以被稱為人的社會存在的需要。第二類需要的一個特徵就是它們不是通過物質利益或條件（指肉體存在的需要），而是通過活動過程本身而得到滿足的。<sup>⑤</sup>

當然，在滿足社會存在需要的過程中需要有物質產品和物質設施為之服務。但與滿足人的肉體存在需要的物質消耗形式和強度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第一，極不相同的物質消耗方式和強度可以提供同樣的非物質需要的滿足，從而為人們廣泛地、合理地選擇非物質需要的形式提供了充分的餘地；第二，由於在非物質需要滿足的過程中，物質消費畢竟是一種輔助性手段，從而與滿足肉體存

---

⑤ 《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87年第2期，第6頁。

在的物質需要的本能性質有了根本的不同；第三，隨著人均廣義收入的增加，在合理內稟物質需要逐步擺脫了技術經濟的約束之後，人們終於有可能來更完全、更充分地考慮合理的物質消費方式。

在人均廣義收入超過一定的臨界水平之後，純閒暇時間的多少及其利用方式，越來越成為生活的主要內容。這時滿足肉體存在需要的物質手段對這種生活內容的影響程度減弱，合理性選擇約束對其影響的程度增強，這就是廣義恩格爾定律能夠成立的內在依據。

**實證材料與經驗證據** 在前文中，我們已基本完成了廣義恩格爾定律的理論推導。現在我們必須為這個定律提供經驗證據。如果讀者認為這些證據不足以說服他自己，那麼他無妨把這個定律看成廣義恩格爾假設。

證據一：第三產業的發展。據 1983 年統計，美國的就業總人口為 1.008 億人，其中，農業等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僅佔 3.5%；製造業、土木建築業等第二產業的就業人口降到 26.8%，而第二產業中製造業的就業人口所佔比重僅為 19.8%。其餘 69.7% 的就業人口都集中在第三產業中。但引人注目的是，其中運輸業、零售業及批發業的就業人口增加不大，而最近十年新增加的就業人口（約為二千萬人）中大多數是就業於信息、廣告、式樣設計、娛樂及旅遊事業。其中，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行業佔很大比重。<sup>⑥</sup> 這類實證材料（不包括發展中國家第三產業的畸形發展）是物質需求比重下降的間接證據。

證據二：在 1980~1983 年經濟危機中，資源產業的不景氣。在從 1980 年到 1983 年襲擊全世界的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受到最嚴重影響的是在帶有石油文明性質的

---

⑥ 堺屋太一：《知識價值革命》第 205 頁。

產業社會中被稱為「基礎產業」的資源消耗性產業。在戰後石油文明的經濟中，人們以「多消費物資是好事」這種思想作為基本出發點，建立了生產設備體系。但是，近年來人們卻開始認為「多消費物資未必是好事」，因而資源消耗性產業的生產能力同市場需求之間產生了差距。在1980~198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所有資源產業、農業、原材料產業都出現嚴重的不景氣。

1983年夏，世界經濟以美國經濟為突破口，大大恢復了元氣。但卻可以看到有很多現象是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石油文明時代不曾有過的。首先，雖然經濟恢復了，但對資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沒有相應地增加；其次，在國際商品市場上，資源、農產品及原材料滯銷。一般說來，世界市場景氣上昇，國際貿易中的商品價格也隨之上昇。但這次卻絲毫沒有上漲。甚至於到市場景氣得到明顯恢復的1984年，出現了反常現象，大多數商品的價格不僅沒有上漲反而下跌。<sup>⑦</sup>

如果我們再聯想到那些最發達的國家近十年來有形（或物質）增長率一直很低這一現象，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種物質增長的相對遲緩或停滯，並不能由資源約束給出完全的說明（如在上例中，景氣恢復，但商品價格沒有相應恢復，以及原材料等市場持續疲軟），它表明了物質經濟在這些國家趨於成熟和停滯這一更深的底蘊。

證據三：對「精神生活」的需求相對增加。到70年代後半期，尤其是進入80年代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隨著環境等問題的出現，歐美各國和日本人的思想方法也發生了變化，人們對物質財富產生了「飽和感」，而對「精神生活」的需求卻增加了。追求過豐富多彩的生活，要求提

---

⑦ 堺屋太一：《知識價值革命》第42頁。



高生活的「質量」，人們所追求的已不是用數量來計算的物質財富的多少，而是更多地追求無法用數量計算的「舒適感」、「外形美」，以及豐富多彩的精神生活等。<sup>⑧</sup> 這類事例是廣義恩格爾定律的直接證據。

證據四：人類合理性選擇變化的趨勢。據斯坦福研究所 1976 年年度報告估計，約有 400~500 萬的成年美國人已自願地大幅度削減收入。而且，這些曾經是高熵工業消費經濟的積極參與者已退出了原來的地位。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把他們信仰的生活方式稱為「自發的樸素」生活方式。這是一種建立在節省物質消費基礎上的低熵生存形式，它注重個性及內心世界的發展，而鄙夷物質主義，在「自發的樸素」生活方式中，生態環境日益受到重視。據斯坦福研究所的數字，還有 800~1000 萬的美國人已部分適應了這種樸素的生活方式。

1977 年 5 月，哈里斯民意測驗有如下結果：美國公眾中有 79% 的人贊同「領導人們怎樣依靠基本必需品生活」；17% 的則偏重「達到更高的生活水平」；76% 的多數人贊成「學會從非物質的經歷中獲得快樂」；17% 的人則選擇「用更多的商品和勞務滿足我們的需求」；59% 的人相信，我們應「真正作出努力，根除污染原因，」而不是「隨著經濟發展找出清理環境的辦法」；82% 的人願意「改進我們現有的交通方式」；而只有 11% 的人認為，「我們應努力走得更遠更快」；77% 的人願意「花更多的時間來增加人類之間的相互瞭解」；17% 的人願意「通過更高級的技術增強和加快我們人際交往的能力」；最後，近三分之二的公眾認為「從工作中尋求內心和個人慰藉」比「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更為重要，比「擴大規模，提高

---

⑧ 堺屋太一：《知識價值革命》第 186 頁。

效率更要緊」；我們應該首先「學會欣賞人的價值而不是物質價值」，其次才是「為生產出更多產品而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sup>⑨</sup> 這些事實為廣義恩格爾定律提供了具有統計意義的證據。

## ◎ 另闢蹊徑

根據前文所說的眾多事例，如消除煙草、毒品等廣泛存在、規模鉅大的有害經濟活動，可以在降低人均 GNP 的情況下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日本和西歐在達到與美國同等人均 GNP 的條件下所耗能源只及美國的一半；不同國家在達到相同的健康水平時人均所耗用的穀物相差懸殊；以及不同時代傑出人物在極不相同的物質生活條件下，所創造出的同樣重大的成就等等；我們可以抽象出下述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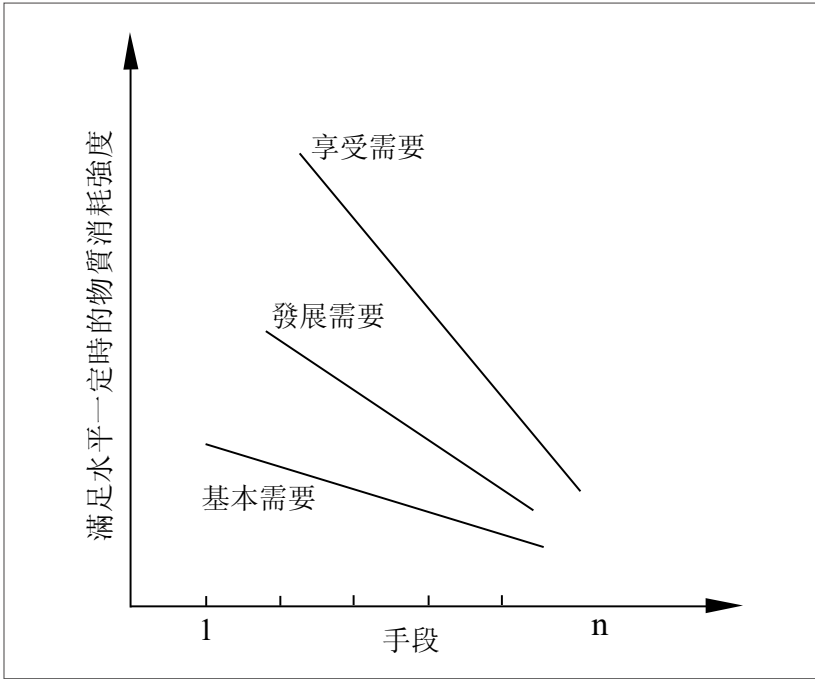
等效性原理：對於人類的基本需要、發展需要和享受需要而言，當其滿足水平和質量一定時，存在著物質消耗強度很不相同的滿足手段譜系；隨著需要層次（特別是超越了肉體存在的需要層次之後）的提高，不僅滿足手段的譜系會隨之擴展，而且不同手段及其譜系之間的物質消耗強度的差別也會隨之擴大。

這個原理可用圖~17 予以形象地說明。在一定程度上說，等效性原理比廣義恩格爾定律的普適性更強。因為前者直接考慮了各種不同的物質約束；而後者在物質約束強度不同時，很可能會在實現程度上被扭曲，如各種有害的消費和生產行為仍普遍存在。

---

⑨ 傑里米·里夫金等：《熵：一種新的世界觀》第 192~195 頁。

圖~17：等效性原理



我們認為廣義恩格爾定律和等效性原理為新發展方式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哲學背景。下面我們把本章最重要的一些結論概括如下。

第一，為了保證人能夠有充足的體力、精力和智力，有效地從事各種積極的物質性或精神性活動，所必需的合理的內稟物質需要（量和質）顯然是有限的。

第二，隨著人均廣義收入的增加，早晚會出現這樣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即物質支出（或消費）佔廣義支出（或消費）的比重下降，而非物質支出（或消費）所佔比重上昇。

第三，在超越了基本需要滿足階段之後，滿足發展需要和享受需要的物質消耗強度低的手段是極為豐富的，並可在很大的範圍內提供所需要水平和質量等級的滿足感。

第四，對於基本需要、發展需要的滿足手段及享受需要的各種形式的選擇不當，是使實際的物質消費大大地超過合理的內稟物質需要（量和質）的基本原因，同時未必能保證提供相應的滿足感。

第五，純粹的技術經濟約束遠不能自動地保證人們做出有效的合理選擇。

下面我們給出廣義恩格爾定律一些有意思的推論，下述三個推論是意味深長的，它對我們現行生活觀的改變，可能會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推論一：當物質消費或支出隨廣義收入而增加時，超過一定的臨界點之後，這種支出的增長對於人類長期發展的有效影響在邊際上是遞減的。

推論二：隨著廣義收入的提高，物質生產和消費的比重降低，在這個方面投入相對少的資源，更有利於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同時還可降低物質消耗強度。

這點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那時，人們生活中佔有相當比重的是旅遊、遠足、與自然融為一體……而這需要清新的空氣、完整而自然的景觀、澄澈的湖泊和江河、蔚藍的海水、高聳的山林、碧綠的原野、絢麗的花朵和鳥兒的歌唱……這樣一種發展不僅不以破壞環境和自然為代價，而且和恢復、保護環境相得益彰。因為在這個方向上投入相對多的資源，不僅減少了污染源，節省了治污費用，而且直接增加了社會財富存量，從而也就增加了人均「收入」流量。

推論三：未來的發展將會以閒暇的有效而充分的利用和人類豐富的精神活動為其基本特徵。

只要人們想一想歐拉、牛頓、麥克斯韋、愛因斯坦和玻爾這樣的科學鉅匠是在遠低於現代的物質消費水平的環境中，創造出了大大超出了我們想像力的精神財富，而

現在大多數人對這些半個世紀以前的科學財富仍所知甚少時，就不難想像出人類活動的真正潛力和未來在何處。

把這些推論和上述幾個結論結合起來，我們會得出一個具有重大實用價值的結論：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在超越了基本需要滿足階段之後，可以能動地選擇物質消耗強度較低的各種滿足手段，而不會降低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水平和質量。這種選擇應該不限於僅僅利用技術經濟約束，而且應盡可能地利用其他約束。

**題外話** 如果我們承認廣義恩格爾定律，那麼一個更為有意思的問題就出現在我們面前：既然人類的合理內稟物質需要是有限的，那麼人類的精神活動是否有極限呢？全面地回答這個問題顯然不是本書所能承擔的，因而只能就一些簡單的看法來和讀者交換一下意見。

首先，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同樣需要時間，而且在單位時間裡，精神活動量顯然也有限。

其次，人在進行創造性精神活動之前，必須花費很長的時間學習、吸收和消化前人的精神財富，而這種財富存量越來越多。

再次，由於普適常數（如最大速度和最小作用量）的存在，使得人們的觀察能力是有限的和不完全的。

最後，對於人們研究事物而言，超過了一定臨界之後，複雜性與精確性表現出不可能兩全的特性。

從這些前提出發，看來創造性的精神活動至少在其所面臨的研究範圍、層次等方面必定存在著極限。因此，研究人類精神活動的形式（包括直覺形式）及其在時間和問題上的合理分佈，無疑會提高這種活動的效能，從而促進人類的發展。

至於是否能從中得出人類精神活動最終將趨於飽和或停滯的結論，目前還不得而知。